

资本转换视角下村庄社会分层及 农牧户致贫机理分析

——基于GZ藏族自治州农区Y村的实证调查

李雪萍^{1 2}, 王 蒙²

(1. 华中师范大学 社会发展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 湖北 武汉 430079; 2. 华中师范大学 社会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摘 要: 资本转换视角下, 生计可以被视为家庭或个人基于生计资本进行交换而达致生计资本转换的行动与过程。不同形式的生计资本通过交换获得转换, 以保证各种生计资本的延续和发展。生计资本容量是村庄社会分层的外在体现, 生计资本转换是村庄社会分层的再生产机制。贫困群体位于村庄社会空间中的底层, 生计脆弱是其致贫的根源, 即家庭易受频发的生计风险冲击且不易从不利影响中恢复, 或生计资本转换限于低水平均衡状态而导致家庭生活质量长期低于社会公认水平。贫困农牧户生计脆弱是微观层面交换脆弱与宏观层面区域脆弱相互建构的过程与结果。

关键词: 生计; 资本转换; 社会分层; 生计脆弱; 致贫机理

中图分类号: C912. 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 - 433X(2015) 04-0076-06

一、问题提出

当前, 我国贫困人口分布呈现向西部和边远地区、高山区、少数民族聚居区等连片特困地区集中的状况, 暴露了以“技术—现代化”^①为核心话语的扶贫开发存在“内卷化”的实践困境, 即连片特困地区扶贫开发绩效并未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国家投入增加而大有改善。基于此,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 - 2020年)》提出将连片特困地区作为新十年“扶贫攻坚主战场”, 希冀通过区域发展与扶贫开发相结合提高该类区域减贫效果。作为抽象程度较高的集合名词, “连片特困地区”聚焦了该类区域的贫困共性: 贫困范围广、贫困程度深、返贫率高。然而, 不同片区之间、同一片区内部均存在着较高的异质性, 如自然地理条件不同、民族文化差异等等。

学术界对连片特困地区贫困治理研究集中于以下视角: 第一, 区域发展视角。该视角以“新区域主义”为理论基础, 连片特困地区通过生产技术和制

度变革突破结构贫困陷阱并形成“内生性发展”动力, 可以采用培育内生性增长机制、构建城市增长极等举措。第二, 多维贫困视角。该视角以多维贫困相关理论为基础, 通过测量或定性分析描绘连片特困地区的贫困特征, 认为该类区域具有生计资本贫困、脆弱性等贫困特征。第三, 反贫困干预视角。该视角强调国家在连片特困地区贫困治理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 认为国家通过均衡性公共产品供给、低碳扶贫、扶贫开发与社会建设同构、建构跨区域治理格局等发展干预路径能够提升扶贫开发效果。总体而言, 上述研究展现了连片特困地区贫困复杂性与治理困难性, 但存在宏观层面研究与微观层面研究割裂的问题, 对贫困形成的动态机制关注不足, 多维贫困结构性致贫与个体性致贫因素内在关联机理未得到清晰阐释。本文以位于连片特困地区的GZ藏族自治州Y村为个案, 以资本转换为视角分析该村社会分层以及农牧民致贫的核心机制, 以此剖析农

收稿日期: 2014 - 12 - 1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新公共服务理论视角下的社区参与研究”(13FZZ003);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建设(培育)项目“中国反贫困发展报告”(11JBG038)。

作者简介: 李雪萍, 女,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贫困治理。E-mail: ccnulp@163.com

① 朱晓阳和谭颖认为国家—政府主导的发展大计划的背景可以用“技术—现代化”这两个关联的层次来表示, 指发展虽然具有“社会主义”前缀, 但实际上是一种非政治性、技术性的“发展”, 这种发展的基本表征是现代化。参见朱晓阳、谭颖《对中国“发展”和“发展干预”研究的反思》, 《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4期。

牧民致贫机理^①。

二、资本转换视角下的生计

生计是贫困治理研究的基本分析路径,其起源于对不同地方人们生活差异性的关注,呼吁直面现实世界且从地方性角度理解穷人生存状况^[1]。该研究路径继承了阿玛蒂亚·森“能力贫困”基本观点,并融合了发展思潮中两类主流思潮:制度是影响经济发展的内生因素;倾听穷人声音并“赋权”于穷人。一般而言,生计指“谋生的方式,该谋生方式建立在能力(Capabilities)、资产(Assets)(包括储备物、资源、要求权和享有权)和活动(Activities)基础之上”^[2]。基于生计的基本内涵,英国国际发展署建构了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强调生计过程中的能动性、结构化过程,并认为“只有当一种生计能够应对并在压力、打击下得到恢复,能够在未来保持乃至加强其能力和资产,同时又不损坏自然基础,这种生计才是可持续的”^[3]。该分析框架揭示了生计内在结构及其之间关联,即以生计资本为基础,选择生计战略,获得生计输出;同时,呈现脆弱性背景、结构和制度转变等外在因素对生计内在结构的制约。然而,关于生计的内核即生计资本转换的条件与机制,该分析框架并未清晰阐释。

阿玛蒂亚·森关于交换权利失败导致饥荒的观点,揭示了交换是理解生计内核的关键。森认为,市场经济中的个人或家庭通过贸易、生产或两者的结合对资源禀赋进行转换,这种转换与一个“社会中的法律、政治、经济和社会特征以及人们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有很密切的关联^[4]。基于此,生计可以被视作家庭或个人基于生计资本进行交换而达致生计资本转换的行动与过程。

生计资本是生计资本转换的基础,其延续了新资本理论的资本观,即资本是在以追求利润为目标的行动中被投资和动员的资源,是生产过程的结果(对资源进行生产或追加价值)以及生产的因子(为了获取利润而进行资源交换)^[5]。新资本理论认为资本具有不同的形式,人类交换活动中花费时间与精力创造出来的所有资本形式都是为了发展出可以在未来增加收益的当前工具和资产^[6]。除非重新思考并分析资本的所有形式,而非仅仅经济理论中所界定的资本形式,才能解释社会世界的结构与运行^[7]。微观社区、家庭或个人层面,各种用于维持生存或谋求发展的资本总称为生计资本,涵盖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以及社会资本五种基本形式。生计资本具有直接或间接的福利效

应,例如促进家庭稳定、创造未来取向、促使专门化和专业化、提供承担风险的基础、增强个人效能、增进后代福利等福利效应等等^[8]。

交换是达致生计资本转换的行动条件,是在情境与结构约束下组合及运用生计资本的策略。不同资本形式相互之间可转换性是交换的前提,转换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并且遵循一定的兑换规则。生计资本分布以及不同生计资本之间的可转换性形成交换策略选择的基础,“这些策略的目的在于通过转换来保证资本的再生产,从而保证各种资本的延续和发展”^[9]。微观层面,不同资本的类型和数量构成了行动者在社会空间中的位置,该位置决定了资本可转换性以及资本转换率;宏观层面,资本所在领域之间的相互关联程度决定了各类资本间的相互转化^[10]。从另一个角度而言,生计资本转换体现出结构与行动之间关系的二重性,即微观交换策略促使资本流动,然而宏观结构中系统边界再生“流动封闭”并形成相互隔离的“交换层面”,打破彼此分离的“交换层面”的能力是经济成功与社会发展的关键要素^[11]。因而,资本及其转换在现代国家和社会的形成中起着重要作用,一方面能够成为建立或者改变制度的强大力量,另一方面成为重要的分层机制而塑造特定的社会关系模式^[10]。

三、生计资本转换与村庄社会分层:农区Y村的个案考察

Y村位于GZ藏族自治州(以下简称GZ州),俗称康区,是我国第二大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区域人口80%为藏族。该州平均海拔3000米,属于大陆性高原山地季风气候,自然灾害频发、生态环境脆弱。Y村为农区村庄,海拔3300米,距离镇政府所在地6公里,距离318国道、215省道2公里,已经实现五通^②。Y村共有41户186人,其中藏族187人,汉族1人。Y村农户承包地面积465亩,种植青稞、小麦、豌豆、土豆等农作物,一年一季,受冰雹、水灾等自然灾害威胁。Y村每家每户均养殖了牦牛,其中养牛大户2-3户,牦牛养殖数约为70-80头/户;其余村民养殖牦牛数量约为10-30头不等。Y村共有草原面积935亩,林地面积152.5亩并全部推行了退耕还林。村庄辖域范围内无虫草、松茸、贝母等药材资源。

① 文中所用资料来源于笔者于2012年7月在GZ藏族自治州Y村进行的实证调查。

② “五通”指通路、通电、通水、通电话、通电视。

(一) 社会分层外显化: 生计资本容量差距。

资本总量和结构是社会分层的主要依据^[12]。社会分层所依据的社会成员表现在不同方面并以不同标准来衡量的差异性,均可看作该个人或群体在不同形式的资本组合比例以及累计上的差异^[13]。在村庄层面,农牧户拥有生计资本的类型与数量直接呈现了其在村庄社会结构中的等级位置。生计资本包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五种基本类型,其中自然资本指生计的自然资源流以及相关服务;物质资本指用以维持生计的基本生产生活资料;金融资本指农牧户可自主支配的可筹措的资金;人力资本是体现在人类活动中的技能、知识和健康状况;社会资本指通过社会网络或更大的社会结构中的成员资格来获得资源的能力。生计资本具有具体性与特殊性,即“当我们提到特殊资本的时候,这意思是说资本只是处在与某一特定场域的关系之中才是有效的”^[14]。换言之,同种类别的资本在不同时间与空间中发挥的功能可能具有较大差异。例如,青稞或小麦秸秆在藏区发挥的功能与内陆农村相比差异很大,其在农牧结合的整体生计模式中作为“以农养牧”资源,对生计十分重要^[15]。

在Y村,农牧户所拥有的生计资本容量有所差异,这种差距可以从农户房屋面积大小以及内部装饰繁简精陋得以呈现。这是由于Y村的大多数住房均为20世纪90年代之后修建,房屋修建情况受到家庭金融资本约束。在农牧业生产具有高度自给自足性、社会资本大多局限于本村亲属关系的情况下,金融资本多寡呈现了家庭人力资本、参与市场经营的物质资本容量的大小。此外,因农村宅基地流转受限、旅游服务开发困难等因素制约,Y村房屋极少作为投资手段,房屋修建及装饰仅用于生活服务。因而,Y村农牧民房屋状况大致体现了村内的社会分层。Y村房屋均为藏式楼房,依据住房面积可以被划分为10柱24间、8柱15间以及6柱12间三种基本类别,其中近半数的住房为8栋15间,半数的住房为6柱12间,仅有4-5户住房结构为10柱24间。此外,房屋内部陈设及装饰水平呈现出较大的差距。ZWBJ为Y村副村长,是该村的富裕户,住房结构为10柱24间,有独立卫生间并配备太阳能热水器,电视、冰箱等现代家庭设施齐全,内部装修十分精美。CQ为Y村村文书,2005年花费家庭所有积蓄15万元修建了8柱15栋的两层藏式民居,装修精美,有独立卫生间并配备太阳能热水器。

RZNM为Y村村民,2011年开始修建房屋,依照KD县扶贫政策获得1万元建房补助。至2012年7月,投入积蓄以及亲戚的借款共3万元,将毛坯房建起来。房屋内外均没有装修,地板铺的是彩色油布,墙壁仍是泥巴,房屋修建及装修仍须投入最少5万元。在Y村,住房条件差异外显化了村庄社会分层,而房屋差异背后隐藏着农牧民生计资本容量的差距。

(二) 社会分层再生产机制: 生计资本转换。

生计资本容量差异以社会分层形态呈现,生计资本转换是社会分层再生产的核心机制。从行动层面来看,交换是达致生计资本转换的基本路径,因而对交换进行剖析有助于阐释生计资本如何转换以及获得何种转换率。交换属于行动者之间的社会互动,互动中每一行动者都处于一定的社会地位,扮演着一定的社会角色^[16]。生计运行过程中,生计资本通过交换实现生计资本转换,此时,生计资本容量获得重构。一般而言,生计中的交换包括自然交换、市场交换、社会交换三种基本形式,相同或不同的交换方式衔接推动生计资本流动,形成动态的生计过程。其中,自然交换指农牧户通过组合与投入生计资本与自然界之间进行的物质交换,常具有历时性特征,包括农牧业生产以及对自然资源的采集;市场交换是经济主体之间通过市场机制进行的一种经济活动,以商品或服务为载体,遵循等价交换、公平竞争的规则,常具有即时性特征;社会交换为嵌入于社会关系网中遵循互惠原则所进行的交换,具有历时性特征。借助于交换,生计资本达致转换,但是不同交换下生计资本转换率具有较大的差异。

社会化大生产打破了藏区农村自给自足的封闭性,“货币约束”逐步凸显,市场交换在农牧户生计中的功能与地位得到重构,与此同时扩展了生计资本转换的路径。在Y村,农牧结合为村庄传统生计,是一种整体性并具有高度自给自足性质的自然交换,即家庭畜牧业为农业生产提供畜力、肥料,农业生产为家畜提供饲料,通过农业和牧业之间的资源流动达到相辅相成。然而,“农牧结合”并不意味着是一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方式,其本身存在严重的内在危机,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畜牧业仍长期处于“夏肥、秋壮、冬瘦、春死”的恶性循环中^[15]。此外,频发的自然灾害常常造成农作物减产或绝收。因而,“农牧结合”非常脆弱,并延续了高度的自给自足性。

“我们家养牛主要是自己吃,从牛羊身上提炼酥油,可以喝酥油茶,这个我们经

常要喝的,你们也要多喝点。我们还可以做奶饼子,几乎家家都会有酥油茶和奶饼子。酥油自己吃不完是可以卖的,奶饼子也是。今年来说酥油一斤可以卖到 30 元,奶饼子还便宜点,每斤 6 元。不过,赚的么得,自己吃得不短,来钱很少很少,实际上做这个(养牛羊)也辛苦的很,每天都要有人来管着。”(Y-CQ-20120706)

为了消解传统生计所带来的风险以及克服“货币约束”,Y 村村民逐步参与市场交换。其一,衔接自然交换与市场交换。Y 村村内虽无虫草等药材资源,但多数村民会前往距离 Y 村数十公里的高海拔有虫草地区,向虫草区域所在地村庄缴纳费用获得采集虫草的权利,随后,将采集的虫草在市场中进行交换获取现金。由于每年采集虫草数量以及虫草价格会发生波动,通过虫草交易所获得的货币收入并不稳定。2012 年, Y 村从事虫草采集的村民所获收入平均约为 8000 元/人。此外,部分养牛大户通过出售酥油、奶渣等产品获得现金收入。以 ZWBJ 为例,2012 年养殖牦牛 80 余头,从畜牧养殖中获得的纯收入约为 1.5 万元。其二,劳动力商品化。Y 村有成年劳动力约 100 人,其中男性劳动力约 50 人。Y 村男性劳动力中多数前往外地找“活路”,并有少数男女成年劳动力在本地餐馆、建筑队打短工。2011 年, Y 村务工村民的平均收入为 4000 元/人。与传统农牧结合生计相比,劳动力商品化涉及家庭分工的变化,农户家庭人力资本在市场交换与自然交换中进行重新配置,并涉及人力资本与其他资本组合的变化。例如,女性劳动力成为农牧业生产的主力军,可能需要添置小型农业机械协助其开展农牧业生产活动。其三,参与市场经营。Y 村 2-3 户农牧户购置了农用车或运输卡车参与市场经营,年收入至少有数万元。由此可见,不同市场交换方式对于促进生计资本容量扩张的能力不同,换言之,生计资本转换率具有差异。

生计资本转换率是生计资本转换前后生计资本容量之比。生计资本转换率越高,生计资本容量扩张越明显,反之亦然。不同交换方式历时性不同,因而,时间维度是考察生计资本转换率对生计资本容量扩张影响的重要因素。从现时性角度来看,在 Y 村,市场交换对于促进村民在村庄社会结构中向上流动作用较强,其中通过购置具有高度流动性的经营性生计资本大大提高了生计资本转换效率。以 ZWBJ 为例,其在 2008 年投入 12 万元购买了一辆农

用三轮车,由其大儿子在本地从事运输,2010 年收回投资成本。2011 年起,雇当地 1 名驾驶员从事运输经营,年均纯利润 2 万元。同年,通过贷款等方式投资 37 万购买一辆大卡车,由其儿子在外地经营运输,2011 年盈利 20 万元,2012 年底收回成本。然而,从历时性的角度,市场交换并不一定是生计资本转换率最高的方式。血缘亲属间通过社会交换达致的生计资本传递是生计资本容量扩张的重要基础。在 Y 村, CQ 在 2005 年新修住房时得到父辈的大力资助,共投入两辈储蓄 15 万元。与之相对比, RZNM 在 2011 年新修住房时没有获取父辈资助,积蓄仅能完成毛坯房修建。总体而言,生计资本转换存在的差异性为 Y 村社会分层的再生产机制。

四、生计脆弱: Y 村贫困农牧户致贫根源

生计资本转换差异造成农牧户生计资本的容量差距,诱致并呈现村庄社会分层。贫困群体在村庄社会结构中处于底层,其生计资本转换并未推动生计资本容量有效扩张反而经常呈现出较强的收缩态势。因而,贫困人口的生存状态,“就像一个人长久地站在齐脖深的河水中,只要涌来一阵细浪,就会陷入灭顶之灾”^[17]。对于 Y 村贫困农牧户,生计脆弱是其致贫根源,即生计资本转换不能应对频繁的生计风险并从生计风险打击中恢复,生计资本转换陷于低水平均衡状态而导致家庭生活质量长期低于社会公认水平。

(一) 交换脆弱: 微观层面贫困农牧户生计资本转换障碍。

微观层面,脆弱性描述了一种生计基本状态,指“家庭面临某些风险的可能,并且是由于遭遇风险而导致财富损失或生活质量下降到某一社会公认的水平之下的可能”^[18]。脆弱性是风险大小与抵御风险能力的综合反映,风险越大,抵御风险能力越低,意味着脆弱性越高^[19]。风险情境中,家庭通过生计资本转化预防及应对风险,生计资本转换的可能性决定了抵御风险能力的大小。因而,穷人或接近贫困的人由于生计资本容量限制或交换障碍而具有更低的抵御风险能力,更趋于脆弱。

Y 村畜牧业生产是农牧民生计的基础,对于贫困农牧户而言更是生计之源。然而,农牧业生产受频发的自然灾害(雪灾、冰雹等)影响,农牧户预防与应对灾害能力十分薄弱,农牧业生产较大幅度呈现“望天收”状态。例如 Y 村在 2012 年春天遭受了雪灾,牦牛大面积饿死或冻死。贫困农牧户 GYL 家中 30 头牦牛中死了 11 头,损失惨重。牦牛既是生

活资料又是生产资料,成长周期较长,因此灾害恢复周期较长。由于Y村内村民多数都有血缘或姻缘关系,村民亦普遍遭受了同类灾害,通过社会交换获得的支持十分少。Y村多数村民通过参与市场交换分散传统生计中所内嵌的高风险性,贫困农牧户由于参与市场交换能力薄弱,其生计脆弱性并未有效缓解。Y村农牧户参与市场交换能力薄弱涵盖两种基本形式:其一,自然交换能力弱限制市场交换参与。Y村虫草经济是农牧民参与市场的主要途径之一,不同农牧户虫草采集能力大有差异。部分贫困农牧户能够采集虫草的人口少,所能采集的虫草十分有限。贫困农牧户BE家中共有6人,其中50岁以上的老年人5人,20余岁的年轻人1人,均无外出采集虫草能力,因而家庭无法通过采集虫草以参与市场交换。部分贫困农牧户家中虽有较为充足的劳动力,然而却无识别虫草的“慧眼”。贫困农牧户GYL家中的女儿和女婿年轻力壮却很难识别虫草。2012年,两人外出找寻4天仅挖出8根虫草。其二,人力资本薄弱限制市场交换参与,并承担较大的市场风险。外出务工是Y村农牧民参与市场交换的基本途径,多从事修房子等体力劳动,务工机会不稳定,收入较低且得不到保障。

“这个地方很难打到工,一般都是到青海省玉树,因为前年那里地震了嘛,那里修房子需要好多人。但是那里路程比较远,还是恼火的很,车费比较贵。最主要的是,你去人家那里打工,干一个月或者两个月甚至更长时间不发工资,有时候老板就跑了,他们就拿不到工钱了,这样连去的车费都么得了。”(Y-DB-20120704)

总体而言,Y村部分农牧户由于交换障碍而无法形成有效的生计资本转换。生计资本匮乏是形成交换障碍的基础原因,与此同时,交换障碍维持或进一步加深生计资本的匮乏。Y村,生计资本匮乏是贫困农牧户的共同特征,并突出体现为人力资本缺失。人力资本在五生计资本中承担着能动性、枢纽性功能,具有较强的资产专用性,人力资本缺失可能导致生计资本转换不能达致最优,生计资本转换可能陷入长期低水平陷阱之中。此外,贫困农牧户在生计资本转换中形成了一定的交换路径依赖(如农牧结合),因而,短时间段的胁迫性脆弱中隐藏着长时期的结构性脆弱。

(二)区域脆弱:宏观层面“交换层面”衔接障碍。

生计资本转换通过交换来实现,而交换嵌入于交换系统中受到结构性因素制约。交换系统是“一个社会结构背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及其他造成权利差异的背景)中的‘互动系统’”,并且“‘结构层次’的建构因素决定着交换活动的机会与制约性因素、动力和意义”^[20]。交换系统包括自然交换子系统、市场交换子系统、社会交换子系统,不同子系统有着不同的交换率^①。此外,交换系统中包括不同的“交换层面”,不同交换层面的重合程度决定了生计资本转换的可能性。Y村位于GZ藏族自治州,该区域的区域属性制约微观层面的生计资本转换。GZ藏族自治州位于连片特困地区,具有较强的区域脆弱性,三种交换方式及其之间的衔接受到制约。具体而言,区域脆弱体现在交换系统内部以及交换子系统之间衔接的结构性障碍。

GZ州交换系统三个子系统的交换属性影响生计资本转换率。首先,自然交换子系统蕴含着结构性脆弱,对农牧业生产造成诸多不利影响。据统计,GZ州产量高并且稳定的耕地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34%,保灌面积占耕地面积的20.74%,中低产田土比重大,耕地质量总体水平不高,且土壤流失严重。农业投入大而产出少,并易受干旱、洪涝等灾害的威胁,青稞每年的亩产不足300斤。草地生态退化的趋势尚未得到真正遏制,严重影响草地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其次,市场交换子系统存在市场发育程度低、市场机制不健全等结构性障碍。藏区经济欠发达而所能提供的就业机会有限,农牧民存在较为普遍的“隐性失业”状况。藏族生态伦理中的“戒杀”等观念使得农牧民主动排斥一些畜牧产品参与市场交换。其三,农牧民面临社会资本困境。农牧民社会资本主要存在于亲属等“强关系”网络中,欠缺“链接社会资本”,呈现出“高整合—低链接”的基本情形。

交换系统子系统间呈现的结构性衔接障碍使得不同交换方式之间不能有效衔接,限制生计资本的有效转换。在GZ州,这种结构性衔接障碍具体体现为自然交换、市场交换、社会交换三者之间的衔接

^①“交换率”由科尔曼提出,指交换发生时行动者应当遵循的规律与规范。他认为“存在着不同的交换率,它们均能使双方获得交换前无法得到的利益,但如果没有交换市场,便无法确定哪个交换率将用于实际”。参见[美]詹姆斯·S·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邓方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47页。

困难,尤其是市场交换与自然交换、市场交换与社会交换不能有效地衔接。例如,农牧业产品的商品率很低是市场交换与自然交换断裂的典型体现,而“高整合—低链接”社会资本促使通过社会交换所获得的信息等资源同质性很高而不利于打工机会的寻觅。此外,交换系统的结构性衔接障碍与交换系

统子系统内部的结构障碍有密切关联。以农牧产品商品化为例,农牧产品的低产出使得农牧业生产呈现出高度的自给自足性,可供参与市场交换的农牧产品十分有限。再者,由于市场机制不健全,农牧民在通过产业化等举措促进农牧产品商品化的过程中,可能会遭遇较大的市场风险而威胁生计安全。

参考文献:

- [1] Ian Scoones. Livelihoods perspectives and rural development [J].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2009 (1).
- [2] Chambers R, Conway G. Sustainable Rural livelihoods: Practical Concepts for The 21st Century [J]. IDS Discussion Paper, 1992, 296: 6.
- [3] DFID.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Guidance Sheets [M]. London: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000: 68 - 125.
- [4] 阿马蒂亚·森. 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 [M]. 王宇, 王王文,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 61 - 64.
- [5] 林南. 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 [M]. 张磊, 译. 上海: 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3 - 4.
- [6]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 社会资本: 流行的狂热抑或基本的概念 [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03(2).
- [7] Pierre Bourdieu. The Forms of Capital [M]//Richardson, ed.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Conn: Greenwood Press, 1986: 47.
- [8] 迈克尔·谢若登. 资产与穷人——一项新的美国福利政策 [M]. 高鉴国,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7: 181 - 202.
- [9] 田向东. 布迪厄与社会实践理论 [J]. *社会经纬* 2000(12).
- [10] 艾云, 周雪光. 资本缺失条件下中国农产品市场的兴起——以一个乡镇农业市场为例 [J]. *中国社会科学* 2013(8).
- [11] 马克·格兰诺维特. 经济社会学的理论日程 [M]//莫洛·F·纪廉, 南德尔·科林斯, 等. 新经济社会学: 一门新兴学科的发展. 姚伟,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59 - 61.
- [12] 林克雷, 李全生. 广义资本和社会分层——布迪厄的资本理论解读 [J]. *烟台大学学报* 2007(4).
- [13] 徐晓军. 阶层间的封闭性与社会变迁研究 [M]//中国社会学学会. 中国社会学学会学术年会获奖论文集 NO. 2(2001·济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444 - 460.
- [14] Bourdieu P. *Sociology in Question* [M]. London: Thousand Oaks and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 1993: 73.
- [15] 强韧. 发展嵌入传统: 藏族农民的生计传统与西藏的农业技术变迁 [J]. *开放时代* 2013(2).
- [16] 许苏明. 论社会交换行为的类型及其制约因素 [J]. *南京大学学报* 2000(3).
- [17] 詹姆斯·C·斯科特. 农民的道义经济学: 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 [M]. 程立显, 刘建, 等,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1: 1.
- [18] 韩崢. 脆弱性与农村贫困 [J]. *农业经济问题* 2004(10).
- [19] 李雪萍. 反脆弱发展: 突破发展陷阱的路径——基于西藏城镇社区发展的实证调查与理论分析 [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2013(3).
- [20] 汤姆·R·伯恩. 结构主义的视角: 经济与社会的变迁 [M]. 周长城,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126 - 127.

(责任编辑 何海涛)